

卫礼贤的传教方法

On Richard Wilhelm's Missionary Approach

孙立新 北京师范大学

Sun Lixi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As a Christian missionary, Richard Wilhelm (1873—1930) never baptized a soul. But he devoted himself to education, to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and the promotion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So he is better known as an accomplished Sinologist. Wilhelm had never for a day given up his Christian faith or missionary calling. He merely chose to carry out his mission in a manner different from his fellow missionaries. His approach to missions reflects his understanding of Christianity and his ultimate concern for mankind and society. To him, Christ was more than a religious leader. He represented mankind and God-given human nature. Before God, all men are equal—Europeans and Chinese alike. Indeed, he felt that the highly sophisticated and rationalistic Chinese culture complemented what was lacking in Western culture. The purpose of his missionary work was to facilitate East-West exchange and to build peace and unity for God's Kingdom on earth.

作为一位基督教传教士,卫礼贤“没有劝说任何中国人皈依基督教”^①,相反,他在办学、翻译中国典籍、评介中国文化和向中国引进德国文化方面成绩显著,最终成为赫赫有名的“汉学家”。尽管如此,卫礼贤并没有放弃传教事业,他只是采取了与其他传教士不同的新传教方法,而这一转变又是与其对基督教的独特理解和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紧密相连的。本文试就此作一简单分析。肤浅和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批评指正。

—

卫礼贤信仰上帝和耶稣,大学期间又专修神学,毕业后担任过代理牧师和牧师。^② 为了能够外出“到遥远的地方去宣讲耶稣的福音”^③,他在1899年加入同善会(Allgemein Evangelisch-Protestantischer Missionsverein),被如愿以偿地派到了刚刚沦为德意志帝国“新殖民地”的青岛,成为一位基督教新教中国传教士。

然而,在到达中国之后不久,卫礼贤就确立了一种全新的传教方法。这一方法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就是:“约束自己按照基督教的基本原则过简单的生活,通过学校和医院来产生影响,与普通人共

① 张君劢,《卫礼贤——世界公民》,蒋锐译,载孙立新、蒋锐主编,《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第27页。

② 关于卫礼贤的生平事迹,参见[德]吴素乐,《卫礼贤(1873~1930)传略》,蒋锐译,载孙立新、蒋锐主编,《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第30-53页。

③ [德]阿尔布莱希特·埃舍,《卫礼贤与巴特·鲍尔》,孙立新,载孙立新、蒋锐主编,《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第63页。

同生活并从精神上接近他们……”^① 此语包含三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约束自己按照基督教的基本原则过简单的生活”。对于这一话语，我们不能仅仅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为衣食的简朴，它实际表明了一种平和的工作作风。在青岛，卫礼贤及其家人居住在安逸的、完全欧洲化的环境中，雇有厨师、保姆和家庭教师，这种生活根本不能说是“简单的”，与广大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准相比甚至近乎奢侈。但与那些“对另一个民族和思想怀有不近人情的误解”^②、在中国耀武扬威、横行霸道的欧洲人完全不同，卫礼贤对中国民众怀有深切同情，时刻关心他们的处境和遭遇，尽力为他们提供帮助。他尤其不能容忍传教士强迫中国人入教受洗，欲使中国“迅速地福音化”的狂热劲头，坚决主张平静地、循序渐进地开展工作的。^③

第二层意思是“通过学校和医院来产生影响”。办学、办医院本来是传教士常用的传教手段，属于间接传教的方法。办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中国基督教社团的下一代施加宗教影响，培养基督教青年担任传教工作的助手。因此，在传教学校中宗教教育一般占有重要地位。同样，医疗传教也是“一种有效的劝人皈依基督

^① Richard Wilhelm. *Die Seele Chinas*. Berlin: Verlag von Reimar Hobbing, 1926, S. 32. 此书有王宇洁、罗敏、朱晋平等翻译出版的中文本：《中国心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可能因为此中文本系根据原著英文本转译的，个别地方与德文本有出入。本人在引用时参阅德文和中文两个版本，凡遇与德文本有较大不同的地方，都以德文本为主，并另加翻译。其余引文则直接采自中译本。

^② [德]W. F. 奥托，《卫礼贤——人格肖像》，蒋锐译，载孙立新、蒋锐主编，《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第6页。

^③ Rennstich, Karl, *Die zwei Symbole des Kreuzes. Handel und Mission in China und Südostasien*, Stuttgart 1988, S. 218.

教的工具”^①，它不仅可以消除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狂妄自大”，充分展示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而且也可以赢得中国人对西方人信任和好感，接受和皈依基督教。^②

卫礼贤办学虽然也是为了传教，但他在学校工作中看到的是西方真正的“社会”任务，即基督教文化民族对非基督教民众的“思想教育”职责。与此同时，他也在学校工作中看到了德中文化双向交流的最佳可能性。^③ 卫礼贤还以赢得中国人的信任为要务，并且希望通过中国官方的认可，使其学生能够参加国家考试，进入上流社会，自上而下的产生影响。因此他在办学过程中，坚持中西并重，既实行西式教育，又不放弃中国的教育，既要让学生掌握西方的历史文化和科学技术，又不使他们远离本民族的文化。他也摒弃任何强迫性宗教教育，不开设宗教课，不举行基督教宗教节日庆典。晨祷时圣经章节与中国经籍文本的宣讲交替进行。星期天做礼拜，参加与否完全自愿。^④

第三层意思是“与普通人共同生活并从精神上接近他们”。卫礼贤虽然身为基督教传教士，担负着指导人们的灵性生活的重任，但他决不自以为高人一等，更不颐指气使地凌驾于中国人之上，指

① Horst Gruender, *Christliche Mission und deutscher Imperialismus. Eine politische Geschichte ihrer Beziehungen waehrend der deutschen Kolonialzeit (1884 - 1914) unter besonderer Beruecksichtigung Afrikas und Chinas*, Paderborn 1982, S. 352.

② Schultze, *Die aertzliche Mission in China*, in: *Evangelisches Missionsmagazin* 28, 1884, S. 29.

③ [德]豪斯特·格林德，《卫礼贤——德国的自由派帝国主义者和中国的朋友》，孙立新译，孙立新、蒋锐主编，《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第90页。

④ Gerber, Lydia, *Richard Wilhelms Missionsarbeit im deutschen Pachtgebiet Kiautschou*, in: Klaus Hirsch (Hg.), *Richard Wilhelm. Botschafter zweier Welten*, Frankfurt am Main/London 2003, S. 167 - 199.

手划脚。相反,他尽力淡化自己所担负的“神职”,以礼待人,谦卑恭顺。当他闻讯德国殖民当局派遣军队镇压高密农民反对铁路铺设行动后,迅速奔赴事发现场进行调解,竭力阻止新的流血冲突。他还设立救护所,救治受伤者,安抚无辜难民。卫礼贤尤其积极结交中国政府官员,与熟读儒家经典的旧文人过从甚密。他聘任平度籍举人邢克昌等担任礼贤中学的教员,讲授中国古典文化。他也拜他们为师,并在他们的指导下刻苦学习和研究中国古典作品。在青岛的时候,卫礼贤还多次到崂山道观与道士们谈经论道,也与康有为建立了不浅的交情。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许多逊清王公贵族、高官大臣迁居青岛,寻求德国殖民统治当局的庇护。卫礼贤看到这些前清遗老中有不少是出身翰苑的饱学之士,马上便与他们建立了密切联系,并与他们一起创办了“尊孔文社”和“藏书楼”。在北京,他也积极参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活动,参加了柯劭忞、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创办的“东方学社”,与著名新儒家张君勱一起编纂德汉词典。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卫礼贤又与蔡元培、胡适和梁漱溟等人建立和保持着密切联系。正是通过与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的接触,卫礼贤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也对基督教传教的意义和作用产生了新的认识。

由此可见,卫礼贤的传教方法是十分独特的,它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传教士的一般工作。洗礼和建立宗教社团的活动完全被放弃了。与之相反,教学和研究工作被赋予了中心意义。那么,此类传教活动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卫礼贤只是笼统地说:“至于由此将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听凭圣灵的创造。”^①联系他的其他话语,我们可以发现他实际上把其工作的重点放到了促

^① Richard Wilhelm, *Die Seele Chinas*. Berlin: Verlag von Reimar Hobbing, 1926, S. 32.

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创立一种综合性世纪文化上了。他要以此为人类的统一奠定基础,为上帝的统治开辟道路。

卫礼贤写道:“过去,东方和西方没有建立联系,各民族各自走自己的路,创造了独特的文明、习俗和组织机构,彼此很不一致。因为缺乏了解,些许传闻只能使人深感惊奇。现在,时代变了。铁路和蒸汽船导致了前所未闻的交往,而这种交往还在不断发展,它也以不容抗拒的必要性把各民族联系在一起了。这肯定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必须对此加以特别关注。上帝不仅希望在各民族之间开展贸易往来,而且也希望使人们越来越多地知道,我们人类在上帝面前均为兄弟姐妹,在上帝面前不存在中国人和欧洲人的区别。因此,各民族的任务是,尽力谋求相互理解和尊重,把各自所拥有的珍贵的精神财富悉数拿出进行交流。”^①

卫礼贤相信,传教对于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在他看来,“传教使命同中世纪的圣战一样,在现代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东方和西方的思想交换。而在现代传教中的这一交换“或许是世界历史所提供的最大和最重要的一次,它不仅是两个相距极其遥远的文化区域的综合,而且也是两个人类时代的综合。”^②它必将为东方和西方带来巨大转变,必将克服它们的对立,也必将实现其相互补充。由此可见,卫礼贤“所追求的目标十分远大,那就是要实现所有世界性大宗教的最深层要求,即人性与正义,和平与各民族人民的友好”。^③

① Wilhelm, Richard, *Eroffnungsrede bei der Feier der Eroffnung der chinesischen Tagesschule in Tapautau*, in: ZMR16, 1901, S. 279.

② Wilhelm, Richard, *Die Seele Chinas*, Berlin: Verlag von Reimar Hobbing, 1926, S. 230.

③ [德]阿尔布莱希特·埃舍,《卫礼贤与巴特·鲍尔》,孙立新译,载孙立新、蒋锐主编,《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第64-65页。

二

卫礼贤传教方法的改变首先是与克里斯托夫·布卢姆哈特(Christoph Blumhardt)的精神指导和传统传教方法所暴露的种种弊端有密切关系。

克里斯托夫·布卢姆哈特原为德国南部小镇巴特·鲍尔(Bad Ball)基督教新教牧师,他在其父亲去世后承担了当地疗养院的领导职责和疗养者的灵魂拯救工作。但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位著名的“宗教社会主义者”。布卢姆哈特对于未来充满信心,坚信会有一个更好的世界到来,认为圣经所承诺的拯救史已经隐含在世界历史之中了,现实世界的所有事变都是朝着它演进的。布卢姆哈特还认为,耶稣基督自古以来始终都是无特权者和无产者的救主,他特别眷顾穷人,祝福他们死后升天,这充分体现了上帝对世界的爱——不只爱个别人或只爱那些公开标榜的基督徒。他反对当时已成为资产阶级的工具,已经忘记了广大民众的需求的基督教会,反对德意志帝国政府镇压工人的政策。他看到一股活跃的社会力量正在发挥作用,这股力量清楚地意识到诸如正义、人类之爱、自由等上帝的意图,并试图在政治上加以推行,那就是:社会民主!因此,他在1899年毅然放弃牧师头衔,宣布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并代表该党进入符腾堡州议会。

布卢姆哈特视野开阔,他是站在全世界和全人类的高度上信仰上帝、思考人生并身体力行的。他自认为是耶稣的门徒和继承者,把社会民主党看作上帝推进拯救史的工具!他发展了一套革命性的新神学:“上帝信任所有人”,或者说:“每个人都是被上帝所信任的”。人们根本不需要归附上帝,成为基督教徒,因为上帝早

就降临在他身上了,对他有无限的信任。上帝的爱无所不包,爱是通向世界的钥匙。世界各民族都是平等的,异教徒可以直接进入天国。“异教徒没有转变成为基督教徒也可以进入上帝之国。他们是为基督而来的,不是为基督教徒及其不吉利的教会而来的。人子(Menschensohn)的原则、人性的原则、社会的义务、通过和平和机构处理政治事务的行为已经开始启动,在异教徒当中也是如此,这是基督精神传遍全球的第一步。不是基督教徒,不是伊斯兰教徒或佛教徒,而是真正的人将成为未来宗教的表现。无论人怎么想,怎么做,都不能阻止各国人民向着追求统一、争取实现更高级目标的人性的大踏步前进,在这里弱者和有缺陷的人将得到体谅和帮助,以便促进其发展。”^①这一新神学完全颠倒了流行的皈依要求和大部分教会教义学说。对卫礼贤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1897年,卫礼贤以代理牧师的身份来到巴特·鲍尔。他很快就与布卢姆哈特一家建立了亲密关系,视布卢姆哈特为精神导师,并娶其女儿莎洛美(Salome)为妻。布卢姆哈特则把卫礼贤看作自己的传教士,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指导他在中国的活动。布卢姆哈特不赞成中国的欧洲化和基督教化,主张“在那个民族中,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和习俗,把反映在基督身上的上帝的本质自然、真实地表现出来,以至于我们欧洲人也可以从中学习不少东西,为一种鲜活的本质而受到激励。”^②中国人“根本不需要成为什么基督徒,我们根本没有理由让这个名称出现在异国他乡。谁遵从上帝的意愿,按照上帝的旨意做事,谁就是天国的孩子,不管他出身于孔子

① Rennstich, Karl, *Die zwei Symbole des Kreuzes. Handel und Mission in China und Südostasien*, Stuttgart 1988, S. 217.

② [德]阿尔布莱希特·埃舍,《卫礼贤与巴特·鲍尔》,孙立新译,载孙立新、蒋锐主编,《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第63-64页。

还是出身于教父。基督作为真理和生活的实践者站在所有待发展的
事物之上。”^①

而当卫礼贤到达中国后，他很快就发现原先的传教实践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传教士不厌其烦地宣讲了大量教条，但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教徒对这些教条根本无法理解。传教士还极力从儒家学说中挑毛病，像对其他宗教一样对它进行百般诋毁，这就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宗教情感和伦理原则，就连比较开明的社会上层人士也不能容忍。更为严重的是传教士利用物质利益吸引教徒，依靠“炮舰外交”的支持干预词讼，致使一些不法分子浑水摸鱼，横行乡里，敲诈勒索非基督教民众。“这种行为非但没有给中国人和教会带来和平，反而造成了恶性循环，教会为了袒护他的教民不断向官府施加压力，用炮舰或其他外交手段相威胁，中国官府只得让步并为讨好教会而镇压百姓，最后积重难返，人民忍无可忍只好造反。他们焚烧教堂，经常不断地杀死传教士，后来外国力量只得出面干涉，派遣炮舰执行处罚，例如占领青岛便是一例——所有的事又都重新开始。”^②

当然，无论在什么时候，也不管在什么国家，都有一些传教士心地善良、态度虔敬、作风正派。对于先他而来中国的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黎力基(Rudolf Lechler)，英国传教士仲均安(Alfred George Jones)、库守龄(S. Couling)和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人，卫礼贤还是十分尊重的。他也看到美国传教士丁韪

^① 布卢姆哈特致卫礼贤，1901年1月21日，转引自[德]阿尔布莱希特·埃舍，《卫礼贤与巴特·鲍尔》，孙立新译，载孙立新、蒋锐主编，《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第64页。

^② [德]卫礼贤，《中国心灵》，王宇洁、罗敏、朱晋平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第181-182页。

良(William Martin)对中国人祖先崇拜思想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并不得不为此忍受其正统派同事的严厉谴责。此外,狄考文(C. W. Mateer)和柏尔根(Bergen)在山东的传教工作也富有成效。卫礼贤特别称赞美国、英国和瑞典各种大学传教团的活动。它们以自由和充分理解的精神为基督教教育工作作出了贡献。^①

同样,中国教徒也不都是些低级、怪异的人,不都是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加入教会的。相反,有相当一部分好教徒,他们“出自虔诚的信仰,并想以传教为生,将终身奉献给这一事业”。许多出国留学的年轻人不仅学到了西方的文化,而且接受了基督教信仰。许多教会组织在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孙中山、冯玉祥以及其他一些革命领袖都皈依了教会。卫礼贤十分欣慰地看到在中国也形成了不少本土基督教教会。它们越来越多地摆脱了传教士错误的影响,积极寻求经济上和政治上独立自主,密切联系本国同胞。中国的教会现在不再是一个与大多数中国人格格不入和对立的团体了,相反,它积极地和富有创造性地参与了普通生活。基督教徒也彼此联系了起来。人们以共同性为重,相互容忍特殊的东 西;某些在欧洲作为历史负担而传承下来的分裂因素,在这里消失了,人们走向了一个勇敢地超越传教士之间的不同的统一的中国教会。就是在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基督教信仰共同性的情感也克服了分裂因素。^②

但是这些传教成果仍不能彻底改变传统传教方法所引起的诸多矛盾,不能从根本上消弭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其神学基

^① Richard Wilhelm, *Die Seele Chinas*. Berlin: Verlag von Reimar Hobbing, 1926, S. 225.

^② Richard Wilhelm, *Die Seele Chinas*. Berlin: Verlag von Reimar Hobbing, 1926, S. 226.

础依然是狭隘的西方中心论的。而为了使福音在中国得以全面展现,必须寻找到一种产生于中国人心灵的表达,要使对福音的宣讲接近于中国教育的精神,要树立“一种去教条化的、中国化的基督教”。

卫礼贤认为在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异教徒;因为所谓异教徒,只是指那种被认为是另类的人,据此,人们不是使他皈依就是罚他下地狱”。欧洲人并不优越于中国人,基督教徒也不优越于“异教徒”。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现实中的人——不论欧洲人还是中国人,也不论基督徒还是“异教徒”——均为上帝的子民。“与受到再三强调的种族对立观点不同,我认为十分珍贵的是,人们只要稍有一点善意就会到处发现人的存在,共同的人的纽带比把人分隔开来的东西更重要。”^①卫礼贤坚决反对“反异端”宗教体制的粗暴行为,主张:“在中国的传教士不能再从一种优越的立场观点出发,自认为属于一个文化民族而面对的是一种较低层次的文化,他们必须采取一种人对人的态度。”^②在卫礼贤看来,“所有的民族都是友好的、忠实的、善良的,只要你以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们,不要老想着从他那儿为自己获取什么,不管是金钱还是劳动,或者,更痛苦的,为了永久地奴役而企图改变他们,或诱使他们加入异己的制度。”^③

卫礼贤坚信:“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把握在一双强有力的手中,所有发生的事件(包括破坏性的和毁灭性的事件)都有助于使

① *Bericht von R. Wilhelm ueber 1. Juli 1. November 1899*, in: *ZMR*1900, S. 29 - 31.

② [德]豪斯特·格林德,《卫礼贤——德国的自由派帝国主义者和中国的朋友》,孙立新译,载孙立新、蒋锐主编,《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第93页。

③ [德]卫礼贤,《中国心灵》,王宇洁、罗敏、朱晋平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第11页。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为人类的统治者。在出自他那里的生活力量当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民众的唯一希望。”^①“基督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的领袖和创始者。他还是人性的神圣代表,他作为人类的领袖,代表了统一的整个人类。这一人性具有非凡的意义,在中国肯定会像在欧洲一样,成为现实。”^② 基督教同样会成为中国未来的宗教,只是“不会以现在存在的教会这种形式,这些教会都是在极为特殊的环境中建立起来的。并不是每一个教会都拥有基督教的全部真理。它们只是必需的框架,临时的建构,不经历很多的困难和繁琐,它们很难从一个地方移植到另外一个地区。”^③ 对于中国人来说,洗礼是不合适的,因为用水举行洗礼的做法原本起源于日耳曼人的风俗,不是为“富有智慧的人”(Geistesmenschen)设立的,如果硬要为后者举行洗礼则应当用“圣灵和火”。^④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新传教区域”也不应当采用“非洲的方法”,就是说建立以传教士为中心的家长制基督教共同体的方法,而是应当采用耶稣召集门徒的方法,建立一个本土化的但又具有强烈普世性的“基督见证人共同体”(Gemeinde wirklicher Erkennen)。^⑤

由此可见,卫礼贤并没有放弃基督教信仰,只是其神学观念比传统教条要开放得多。他相信对于在中国的传教工作来说,“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必须对他人抱以极大的信任,借此,他们当

① Rennstich, Karl, *Die zwei Symbole des Kreuzes. Handel und Mission in China und Südostasien*, Stuttgart 1988, S. 218.

② [德]卫礼贤,《中国心灵》,王宇洁、罗敏、朱晋平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第143页。

③ 同上。

④ Gerber, Lydia, *Richard Wilhelms Missionsarbeit im deutschen Pachtgebiet Kiautschou*, in: Klaus Hirsch (Hg.), *Richard Wilhelm. Botschafter zweier Welten*, Frankfurt am Main/London 2003, S. 176 - 177.

⑤ 同上。

中的好东西便可以显露出来并被用来服务上帝。”^①那么，卫礼贤又是怎样看待中国文化的呢？

三

与大多数传教士不同，卫礼贤对中国文化深怀敬意，他不仅通过艰苦卓绝的深入研究洞悉了其中的许多奥妙，而且还发现了弥补西方文化缺陷的灵丹妙药。

19世纪时，基督教传教士普遍把中国看作是一个贫穷、落后、停滞的“异教大国”，认为中国人低级粗俗、道德败坏。中国里里外外都衰败不堪，法律崩坏，政治腐败，道德水准下降到最低点。道德生命力的完全丧失、无条件的责任感的缺乏、极端的自私自利、国民性格普遍的虚伪、贪污受贿、残忍、不道德、迷信、偶像崇拜。中国文化已经不能继续发展了。它已经衰老不堪，失去了活力，不能适应现代生活严肃的、奋发向前的发展要求。只有“强盛的、充满活力的”西方国家才能给中国输入“新鲜血液和新生活”，使它从数百年冬眠中醒来。西方文化是预告天亮的黎明晨光，只有它才能推动中国向前发展。而西方文化的基础是基督教。基督教精神构成了西方文化的精髓。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因此，中国迫切需要基督教。

传教士也坚决反对中国传统的信仰、习俗、礼仪和权威，要求用西方文化取代中国的传统文化，主张维护殖民体系，赞同殖民列强所实行的武力政策及其对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严厉镇压。虽然不能不承认中国人民拥有勤劳、好客、主持正义等优秀品质、拥有

^① Bericht von R. Wilhelm ueber 1900, in: ZMR16, 1901, S. 90.

较高的智力水平和较强的集体精神，——因为“上帝之光偶尔也会照射到异教徒当中，中国的情况比其他异教国家或原始部落要好些”——但是他们从未把中国人看作是与西方人地位平等的。中国人只是比“原始的”、“未开化”野蛮民族和其他“异教”民族好一些，与西方人相比仍是“低级的”、“劣等的”。在这种观念背后隐伏着强烈的种族歧视态度和基督教—西方文化优越论思想。正是基于对中国文化的蔑视和对基督教—西方文化的“优越”性的坚信，传教士们极力要把全世界都纳入西方文化体系，使之“基督教化”和“文明化”。

卫礼贤对中国的看法与之完全不同。他反对欧洲人对祖先崇拜的夸大其词^①，认为中国官员并不像欧洲人所认为的那么腐败，所谓溺婴是中国民间的一种风俗不过是那些以偏概全的传教士荒谬的杜撰，所谓“黄祸”只是欧洲人心中的空洞的幻影。^② 他反对认为中国人很残忍的观点。因为“不能说所有的人都是残忍的，就好像不能说人是好是坏一样。至多也只能说某种习惯和风俗有一定的传统”。^③ 在卫礼贤看来，中国人一点都不残忍，相反，他们可能是人类大家庭中最温顺的一员。中国人是富有同情心的，他们在任何需要帮助的情况下都会表现出友好的和乐于主人的态度。^④ 就连中国人的反洋教斗争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人并非都对外国人充满敌意，他们只是想挣脱西方人制造的令世界窒息的

① [德]卫礼贤，《中国心灵》，王宇洁、罗敏、朱晋平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第322页。

② 同上，第315页。

③ 同上，第221页。

④ 同上，第221—222页。

泥沼。^① 卫礼贤还反对那种认为中国停滞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已经觉醒，中国决不会衰落。她有能力将自己从“白色恐怖”中解脱出来，并且有些人能够理解欧洲文化的特色，从它阴暗地表现面中区分出来。^②

卫礼贤尤其对中国人的生活智慧产生了浓厚兴趣：“中国人从未脱离世俗母胎，也使他们在作为宇宙的世界中找到了最终和谐。他们虽然看到了现实世界中许多不如人意的东西，但没有因此而悲观厌世。他们清楚地知道，世上万物最终都会达到和谐境地。”^③ 在中国，个人被牢固地置于宗族、国民和人类重叠的有机组织中。中国社会的秩序恰恰是建立在下列认识基础之上的，即每个人都有其自然的、属于他自己的位置，他的存在由此得到充分认可，任何逾越都是不合法的，也是不合要求的。因此，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狂妄自大的虚傲没有任何地位，因为任何人都不能对别人占据的位置产生争议，要求非分之得并非英雄行为而是犯罪，但是争取其合法地位却是合情合理的。因此，中国人一方面有无条件为其合法地位而奋斗的坚韧性，另一方面又会心满意足，不抱任何异想天开的幻想。在中国没有重大的悲剧性，虽然悲惨之事、可怕之事、由错误导致的恶果经常发生，但是中国人内心从不厌弃世界，因为义务的大小不是建立在不同基础之上，而是构成一个统一的联系。在中国有一系列的义务，人们只要心地善良就能正确行事。中国人爱生活，更爱义务。如果两者不可兼得，则舍生取义。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足以排除所有的悲剧性。中国人也很爱

① [德]卫礼贤，《中国心灵》，王宇洁、罗敏、朱晋平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第204页。

② 同上，第204页。

③ 同上，第182页。

面子,强调名正言顺,外在的与内心的通常都会被调节到和谐状态。

任何文化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中国文化也以一定的经济和地理关系为基础,对此,卫礼贤有很好的说明。他指出,中国文化是一种“农业形式的文化”,它首先是以广阔的地域为前提的。在这里,只要正确地安排现有生产力,就可以保证人们过上温饱的日子。其次,它也是以社会内部高贵者与低贱者、富人与穷人之间紧张关系的适度为前提的。只有这样,紧张关系才可以通过习俗和等级秩序来加以调解,富人和高贵者能够承担其社会义务,并从家庭关系和谨慎的考虑出发,与其他阶层团结在一起。再者,联结各社会阶层的统一纽带还没有出现断裂,在抵御外来侵犯时,全体国民能够本能地集合于一体。^①应当说,这种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它充分考虑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质和它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传统的中国文化,的确是小农经济和农业社会的产物和反映。

卫礼贤还看到,古老的中国文化在西方先进经济、技术和军事的威逼下,面临着严重危机。他写道:西方的机器文化因为简易,在世界范围内胜利进军,所向披靡,到处破坏着土著居民的文化遗产。西方列强同样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并在其势力范围内完全剥夺了中国人的权利。中国成了西方列强的剥削对象,金钱大量外流,贫困化程度日益加剧。西方商品的大规模倾销剥夺了数以百万计农业手工业者的生路,造成了严重的无产阶级化问题,与之相应,中国的社会道德水准日益下降,中国文

^① Richard Wilhelm, *Ost und West*, in: Wolfgang Bauer (Hrsg.), *Richard Wilhelm. Botschafter zweier Welten*, Duesseldorf/Koeln 1973, S. 184 - 185.

以维持的大家庭分崩离析。^①“欧洲金钱向前推进，欧洲的军量远远优越于中国，中国的顽固排拒愈来愈无力。欧洲的思想像瘟疫一样到处传播，严重侵蚀着中国文化，有的甚至像毒样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机体内，并且毒性愈来愈大。”^②

尽管如此，卫礼贤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仍情有独钟。他断言，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具有同等地位和同等价值。中国文化虽然古，但这决不意味着它比西方文化低级，因为“在某些方面，老者与轻者并无高下之分”^③。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不是原始与高级、粗糙与精细、不完善与完善的关系。卫礼贤还强调，中国人无论在保存其传统还是在接受新事物方面，都具有无与伦比的高超能力。虽然欧洲精神已经深深侵入中国人当中，正在极力改造其精神，但它并没有彻底摧毁中国人的顽强生命力。相反，在某些方面，中国人完全能够很好地适应欧洲精神，例如妇女问题在很短时间内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④卫礼贤写道：“欧洲文明的入侵并没有使中国人彻底衰亡，这一点完全不同于我们在别的地方所经历的情形。在那里，欧洲文明在原始的土著居民当中可谓所向披靡。中国人民具有无与伦比的顽强生命力，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人的大脑容量有限，不能接受欧洲的科学。相反，欧洲的科学很容易被中国人接受，甚至连许多手工业者都能够很快习惯外来的坐标系。数千年来练就的技巧和中国文化的方法，使他们很容易

① Richard Wilhelm, *Politische Entwicklungen in China*, in: *Sinica*, 2, 1927, S. 153-164.

② Richard Wilhelm, *Die Krisis der chinesischen Kultur*, in: *Sinica*, 3, 1928, S. 224.

③ Richard Wilhelm, *Ost und West*, in: Wolfgang Bauer (Hrsg.), *Richard Wilhelm. Botschafter zweier Welten*, Duesseldorf/Koeln 1973, S. 187.

④ Richard Wilhelm, *Die Krisis der chinesischen Kultur*, in: *Sinica*, 3, 1928, S. 225.

做到这一点。”^①

总的说来,卫礼贤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高度发达的、理性的文化”^②,它是“一种植根于自然本能不间断生存之中的文化,是一种美化自然的文化”^③,它展示了一种“追求和谐、遵循宇宙和社会中组织理性的理想”^④。它也展示了“一种营养均匀的和谐平衡状态,在此,全体的共同事业承载并支撑着个体家庭,正如个体家庭构成国家权力和财富一样”。^⑤因此,中国人的生活是“比较幸福和满足的,从未因思想单调而萎靡不振”,即使那些处于社会最下层的中国人的生活也是如此。^⑥中国文化恰恰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欠缺。中国人的生活智慧是一剂“良药”,是“拯救现代欧洲的有效工具”。^⑦中国人对“内心世界、人、生活艺术、组织化”的重视,正好可以纠正西方人思想的片面性,因为除了外在世界、客观事物、技术、制度外,内心世界、人、生活艺术、组织化也非常重要。卫礼贤把这种认识称作“来自东方的光辉”,欧洲人“亟需其照耀。”^⑧

① Richard Wilhelm, *Die Krisis der chinesischen Kultur*, in: *Sinica*, 3, 1928, S. 224.

② Richard Wilhelm, *Die Krisis der chinesischen Kultur*, in: *Sinica*, 2, 1927, S. 167.

③ Richard Wilhelm, *Die Krisis der chinesischen Kultur*, in: *Sinica*, 3, 1928, S. 211.

④ Richard Wilhelm, *Ost und West*, in: Wolfgang Bauer (Hrsg.), *Richard Wilhelm. Botschafter zweier Welten*, Duesseldorf/Koeln 1973, S. 184.

⑤ Richard Wilhelm, *Die Grundlagen der chinesischen Kultur*, in: *Sinica*, 2, 1927, S. 167.

⑥ Richard Wilhelm, *Ost und West*, in: Wolfgang Bauer (Hrsg.), *Richard Wilhelm. Botschafter zweier Welten*, Duesseldorf/Koeln 1973, S. 184.

⑦ Richard Wilhelm, *Ost und West*, in: Wolfgang Bauer (Hrsg.), *Richard Wilhelm. Botschafter zweier Welten*, Duesseldorf/Koeln 1973, S. 187 - 188.

⑧ Richard Wilhelm, *Licht aus Osten*, in: Wolfgang Bauer (Hrsg.), *Richard Wilhelm. Botschafter zweier Welten*, Duesseldorf/Koeln 1973, S. 175 - 176.

四

在研究中国文化的同时，卫礼贤也反观自身，对西方文化进行了认真检讨。通过反省，他对西方文化本质特征及其缺陷有了比较深刻的把握，也提出了在综合东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创立一种世界文化的主张。

自 18 世纪中叶起，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乐观主义进步观和基督教—西方文化“优越论”在西方社会普遍流行，海外殖民扩张和海外传教活动大规模展开。到 19 世纪末，地球上一半多的土地和三分之一的人口均被西方列强所占领和控制，基督教传教士深入海外，足迹遍布世界各地。然而，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分割世界、夺取世界霸权而展开的激烈斗争，也使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理念受到了严重冲击，使欧洲的世界领导地位受到严重破坏。

对于西方文化的特征和缺陷，卫礼贤很早就开始了深刻反思。在他看来，西方文化的突出特征就是“生活的不断机械化和合理化”。^①因为欧洲精神具有强烈的“向外推进”的冲动，它以研究客观物质世界为重点，以“改造和控制”客观物质世界为主要目标。通过研究和实践，人们认识到“物质材料的原子结构”，发现了客观物体所具有的“因果关系”律，于是用“机械的观点”来看待和处理客观物体、用“强力”手段来控制客观物体，便成为欧洲人或西方人惯常的思维和习用的方法。“数学—机械科学和广义的技术”日益

^① Richard Wilhelm, *Ost und West*, in: Wolfgang Bauer (Hrsg.), *Richard Wilhelm. Botschafter zweier Welten*, Duesseldorf/Koeln 1973, S. 177.

兴盛,最终导致欧洲现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①“西方人在最近一个世纪里创造了一种机械文明,它胜过有史以来在地球上出现的所有发明创造,其影响波及全人类,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别文化。各种各样的机器第一次发挥出巨大作用;它们不再依赖于人力或畜力,而是强迫机械帝国供其使役。”^②

卫礼贤深知工业革命和机器大生产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重大变革,它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也在社会和政治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看到,在历史上,畜力的使用曾经促使父权制取代母权制,使男性获得了统治地位。因为用牛耕田需要较大的力气,需要男人来做,妇女因力气小,只能从事家务劳动,这就自然而然地提高了男人的权力和地位。现在机器“造成了男女平等”,它极大地节省了力量,妇女和儿童几乎可以同男人一样进行操作。机器还“造成了无产阶级化”^③,大批民众丧失了除自身劳动力以外的所有生产资料,不得不走进工厂,孤立无援地遭受着“企业主的剥削”^④。其政治后果则是:“不仅家长制的婚姻关系告停,而且英雄式的世袭国家也不复存在。平民大众获得了胜利。”机器文明还有强烈的扩张性,“它必然要向世界各地进行扩张。而且它到达哪里,哪里的本土文化就要消失。正如外来的老鼠赶跑家鼠一样,机

① Richard Wilhelm, *Licht aus Osten*, in: Wolfgang Bauer (Hrsg.), *Richard Wilhelm. Botschafter zweier Welten*, Duesseldorf/Koeln 1973, S. 167.

② Richard Wilhelm, *Ost und West*, in: Wolfgang Bauer (Hrsg.), *Richard Wilhelm. Botschafter zweier Welten*, Duesseldorf/Koeln 1973, S. 189.

③ Richard Wilhelm, *Ost und West*, in: Wolfgang Bauer (Hrsg.), *Richard Wilhelm. Botschafter zweier Welten*, Duesseldorf/Koeln 1973, S. 189.

④ Richard Wilhelm, *Ost und West*, in: Wolfgang Bauer (Hrsg.), *Richard Wilhelm. Botschafter zweier Welten*, Duesseldorf/Koeln 1973, S. 194.

器文明对于全人类所有其他生存形式都会发生毁灭性的影响”。^①
“机器文化毁灭所有其他文化，因为它太简易了。”^②

然而，卫礼贤更清楚地洞察到了西方文化所隐含的弊端，他批评“欧洲精神在个人修养和社会组织方面的失灵”^③。在卫礼贤看来，欧洲社会主要是以一大批专业人员为支柱的，这些人的强项在于不断发展的专门化，而面对所有不属于他们专业范围的领域，他们只能是一帮“原子人和物质人”（*Atommenschen und also Massenmenschen*）。他们习惯于从机械和技术的角度来观察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习惯于用“强力”手段来调整、处理社会组织事务。这当然是很不合适的。卫礼贤指出：“欧洲社会组织的目标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即强力政治。当这个目标被一些实力几乎相同的权力集团所追求时，世界大战就必然要发生。这个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足以说明强力政治的荒谬性。”他还特别指出：强力政治是“现代欧洲精神固有的特性”，因此，“厌恶和仇恨情绪弥漫在这个文化圈的各成员国之间，它们也使我们看不到欧洲各国本质上的一致性。兄弟之间的相互敌对可能会使他们完全忘记他们本来同出一家”^④。

卫礼贤深信，中国精神对于人类的继续发展有无比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扪心自问，中国以其丰富的历史遗产可向我们提供

① Richard Wilhelm, *Ost und West*, in: Wolfgang Bauer (Hrsg.), *Richard Wilhelm. Botschafter zweier Welten*, Duesseldorf/Koeln 1973, S. 189.

② Richard Wilhelm, *Ost und West*, in: Wolfgang Bauer (Hrsg.), *Richard Wilhelm. Botschafter zweier Welten*, Duesseldorf/Koeln 1973, S. 190.

③ Richard Wilhelm, *Licht aus Osten*, in: Wolfgang Bauer (Hrsg.), *Richard Wilhelm. Botschafter zweier Welten*, Duesseldorf/Koeln 1973, S. 168.

④ Richard Wilhelm, *Licht aus Osten*, in: Wolfgang Bauer (Hrsg.), *Richard Wilhelm. Botschafter zweier Welten*, Duesseldorf/Koeln 1973, S. 168.

什么东西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抑制这样的见解,即中国自古至今的绵延不祚,对于人类继续发展恰恰具有命中注定的意义。”^①欧洲必须承认其他有才智的民族为世界民族社会中完全平等的成员,必须放弃它迄今在实践中一贯实行的独裁统治。^②它必须向东方学习,虚心接受中国文化中对西方有益的东西,特别是中国人独特的精神气质和生活智慧,对于西方人蔚为重要。

欧洲人必须学会像中国人那样过孩子般的生活。“古代中国的生活智慧拥有孩子般的单纯力量。中华民族虽然十分古老,但他绝不带任何年迈的气象,而是像孩子一样和善无害地生活着。这种和善完全不同于无知或原始,它是深晓事物大义的人才能具有的特性。从这种和善中,生命之泉会不断流出汨汨新水。因此,一个中国人会全然不计他曾做过什么,他对外界做出了何种贡献,他只关心自己作为一种存在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这种存在不是毫无生气的暂时存在,而是一种力量强大的、具体的现实,它能产生影响,并且影响巨大,因为它不考虑自己,只表达一些理所当然的、无意识的东西。这就给予人们莫大的安宁和自制。中国人的眼光并不停留在自己带有偶然性的小我上,而是深入人类的根底。他们听天由命地生活着,并因此而成为自主者,不为表面的波涌而动摇。有一句中国谚语说得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于领袖们来说还要具备耐心,不要仓促行事,只追求表面上的成功。他们善于对刚刚萌生的事物施加影响,能够长时间施展塑造的魔力。”^③

① Richard Wilhelm, *Ost und West*, in: Wolfgang Bauer (Hrsg.), *Richard Wilhelm. Botschafter zweier Welten*, Duesseldorf/Koeln 1973, S. 187.

② Richard Wilhelm, *Ost und West*, in: Wolfgang Bauer (Hrsg.), *Richard Wilhelm. Botschafter zweier Welten*, Duesseldorf/Koeln 1973, S. 195.

③ Richard Wilhelm, *Ost und West*, in: Wolfgang Bauer (Hrsg.), *Richard Wilhelm. Botschafter zweier Welten*, Duesseldorf/Koeln 1973, S. 187 - 188.

卫礼贤认为这就是西方人所需要的、而由古老的中国能够给予的东西。简言之，在中国人的生活智慧方面，西方人必须甘当小学生。

卫礼贤对西方文化的反省和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当时在西方社会已经出现的反对占统治地位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精神思潮有联系的。然而，与那些厌倦文明、敌视进步、不再信任人的理性的悲观主义论者不同，卫礼贤并没有完全否定西方文化的价值，相反，他充分肯定机器文明对未来人类文化的重要性，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将成为人类的共同财产，“机器技术的胜利进军为每一种未来可能的文化都奠定了一般基础”^①。卫礼贤也看到，欧洲现代文明的崩溃与先前一些文明的衰落过程——逐渐停滞、僵化和粗糙——不同，欧洲及其文明已达到相当完善精致的程度。像欧洲对世界大战中用于自我残害的破坏机器的天才构思，以前时代是未曾有过的。欧洲文化的精神基础虽然崩溃了，但是它的文化手段仍继续存在，即使今天，欧洲的科学技术仍居世界各国之首。^②西方文化还拥有这样的精神力量：它们在人类未来的发展中对其他民族也有重要价值，这就是“个人独立自主的自由性”^③。因为在未来社会中，束缚个人的自然羁绊将越来越松弛，社会组织越来越有意识、合理化和自由。将来文化灵魂的承担者不再是团体，而是

① Richard Wilhelm, *Ost und West*, in: Wolfgang Bauer (Hrsg.), *Richard Wilhelm. Botschafter zweier Welten*, Duesseldorf/Koeln 1973, S. 195 - 196.

② Richard Wilhelm, *Ost und West*, in: Wolfgang Bauer (Hrsg.), *Richard Wilhelm. Botschafter zweier Welten*, Duesseldorf/Koeln 1973, S. 193.

③ Richard Wilhelm, *Ost und West*, in: Wolfgang Bauer (Hrsg.), *Richard Wilhelm. Botschafter zweier Welten*, Duesseldorf/Koeln 1973, S. 198.

个人。^①西方文化中的自由主义传统,必将成为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因此,西方人没有理由自暴自弃,而应当对自身文化的优缺点有全面准确的认识,自觉地扬长避短。他们也应当虚心向其他民族学习,积极寻求纠正西方文化弊端的良策。

卫礼贤满怀信心地指出,未来的人类完全能够缔造一种新文化,一种不受时间空间条件限制、综合所有文化遗产特别是东西方文化遗产而形成的世界文化。“过去的遗产必须作为文化的基础来利用。这些遗产现在已不能再自然而然和纯粹偶然地进入未来的人的精神,人们必须通过新式教育有意识地把它灌输到新一代人的头脑里,它会成为一种新的自我塑造传统。在植物种植和动物饲养中人们已经获知:新的物种是完全可以被创造出来的,这些物种因为符合人的意志,所以会比自然的物种更富有生命力。人们可以像对待别的自然物一样来与它们打交道。在植物界、动物界可能的事情,在人类世界同样会是可能的。实际上,人们也总是以这样的方法来传播文化的。”^②而要摆脱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必须要有两种东西:首先是深入到自己的下意识,根据神秘主义的统一观和直觉本能来认识人的存在,开辟新的生路。这是东方好的方面;另一方面,它需要进一步加强个人的独立自主,直到获得力量能够抵御外部世界的所有压力。这是西方好的方面。“在这块土地上,东方和西方作为互不可缺的姐妹团聚在一起。”^③

总而言之,卫礼贤并非有放弃传教使命,他只是反对现存的教

① Richard Wilhelm, *Ost und West*, in: Wolfgang Bauer (Hrsg.), *Richard Wilhelm. Botschafter zweier Welten*, Duesseldorf/Koeln 1973, S. 196.

② Richard Wilhelm, *Die Krisis der chinesischen Kultur*, in: *Sinica*, 3, 1928, S. 228 - 229.

③ Richard Wilhelm, *Ost und West*, in: Wolfgang Bauer (Hrsg.), *Richard Wilhelm. Botschafter zweier Welten*, Duesseldorf/Koeln 1973, S. 198.

会和传教的实践,试图寻求一种新的传教方法。而这种传教策略的转变不仅有着独特的神学背景,而且也是建立在对东西方文化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仅仅把卫礼贤看作一位汉学家,而不了解其神学背景和宗教思想在他从传教士到汉学家的转变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就不可能对他的事业作出恰当的评价。